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有所思

十常侍祸乱东汉王朝

□ 刘跃斌

宦官是中国封建政权架构中一个独特群体，因为他们有接近皇帝的便利条件，其中便出现了一些野心家阴谋家。东汉末年的十常侍就是宦官群体中的野心家阴谋家集团。

（一）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故事一开头就讲导致“一统天下”的汉朝“分为三国”的“致乱之由”，是因为汉桓帝（公元146—167年在位）“禁锢善类，崇信宦官”，特别是汉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继位后，宦官“张让、赵忠、封谞、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灵）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于是而有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为首的黄巾农民起义。由于张角起义军声势浩大、所向披靡，汉灵帝下诏“令各处备御，讨贼有功”，各路地方势力配合官军镇压了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被镇压后，手握重权的十常侍把国家名器化为个人牟利的工具，由此加剧了宫廷内部的斗争，最终导致了汉朝的灭亡，开启了三国时代。

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上说的“十常侍”与《三国演义》略有不同，指的是汉灵帝时操纵政权的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个宦官。在这十二个宦官中，张让、赵忠是首脑人物，在历史记载中提到的也主要是这两个人。

（二）

“常侍”在西汉时是皇帝近臣的一种加官（原有官职外兼领的其他官衔，以示尊崇），仅是虚衔，又称“常侍郎”，西汉晚期称“中常侍”。东汉时中常侍不再是加官，成为有具体执掌的官职，并且主要由宦官担任，例如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就曾任中常侍。到汉安帝（公元106—125年在位）时，中常侍全部由宦官担任，并委以重任，人数也由开始时的四人增加到十人，东汉末增加到十二人。由此，宦官成为东汉中央政府中一股重要力量，有时竟可权倾人主。

十常侍的崛起源于东汉后期外戚和宦官之间的斗争。

东汉共有13个皇帝，但是只有前三个皇帝即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章帝刘炟登基时是成年人，其他或是十几岁的少年，或是几岁的儿童，甚至还有一两岁的婴儿，不能实际掌握和行使权力，而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一是母后，一是宦官，于是皇帝的权力就或者落在以母后为核心的外戚手中，或者落在宦官手中。这两种势力都想掌握最高权力，为此互不相让，往往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

汉灵帝继位后，十分信任十常侍，予以重用，并封张让、赵忠为列侯。灵帝去世前，在两个儿子刘辩和刘协谁来继承皇位上犹豫不决，但倾向于刘协，便把他托付给西园军（汉灵帝为分何进兵权，在洛阳西园设立的一支禁军）首领宦官蹇硕。刘辩是何皇后所生，何皇后的哥哥何进是大将军。汉灵帝去世后，蹇硕想先杀掉何进，再立刘协为皇帝。但蹇硕手下有个人与何进关系很密切，便示意何进，于是何进抢先立刘辩为皇帝，是为汉少帝，尊何皇后为皇太后，主持朝政，并打算诛杀蹇硕等宦官。蹇硕写信给中常侍赵忠、宋典等人，建议及早动手处死何进，但中常侍郭胜与何进兄妹关系亲近，他与赵忠等商议，不仅拒绝了蹇硕的建议，还把蹇硕的信送给何进看，于是何进逮捕并处死了蹇硕，控制了禁军。

这时，袁绍建议何进乘机消灭宦官集团，“为天下除患”，何进也有此意，但是何太后以宦官管理皇宫内部事务是汉朝制度为由不同意，何进的母亲和弟弟多次接受宦官们的贿赂，也反对何进诛杀宦官。何进优柔寡断，迟迟没有动手，但其铲除宦官之心却没有停止。他接受袁绍的建议，命令西北军阀董卓率军进京。这样，何进集团与宦官集团的矛盾日益加剧，势同水火。张让、段珪等经过密商，假传何太后旨意召见何进，乘机将其杀死。何进的部下袁绍等人领兵进攻皇宫，对宦官大开杀戒，赵忠等被杀，张让、段珪挟持皇帝刘辩和刘协等逃出宫外，跟随他们出逃的官员义愤填膺，在路上又杀死了几名宦官，张让等见大势已去，投河而死，十常侍至此覆灭。

（三）

十常侍为了取得皇帝的信任，巩固自己的权位，不顾民生疾苦，大兴土木，修造宫室，即使是在黄巾起义爆发后仍照旧征敛无度，诛求无已。

黄巾起义的第二年，宫殿之一的南宫因灾受损。张让、赵忠等怂恿皇帝下令在全国征收田亩税，同时从太原、河东、狄道等郡征调木材、文石等建筑材料。对送到京师来的这些建筑材料，十常侍却经常故意刁难，说它们不合格，大大压低收购价格，借此机会“多受赇赂”，地方官员只得继续从民间征调，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官员升迁、任命，也必须拿出多少不等的“修宫钱”，以致逼得有人自杀。钜鹿太守司马直新被任命，他一直清廉自持，十常侍假惺惺地告诉他可以少缴“修宫钱”，他仍然不愿从命，怅然说：“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于是以疾病为由辞官，但是未获批准，于是他“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古今祸败之戒”，然后吞药自杀。

据记载，十常侍还为汉灵帝“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其中”；“又还河闲买田宅，起第观”；“缮修南宫玉堂”；“又铸铜人四列于仓龙、玄武阙”；“又铸四钟，皆受二千斛，县于玉堂及云台殿前”；“又铸天禄虾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从史书记载中这一个个“又”字，既可知道十常侍千方百计讨好灵帝，极尽其能事，也可看出史家对十常侍的贬斥和厌恶。可惜汉灵帝颟顸昏聩，对十常侍的这些奉承之举非常满意，很是受用，以致常常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有了皇帝的赞许和撑腰，十常侍更加有恃无恐，“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把自己的房子也建造得跟皇宫似的。汉灵帝常登上宫内的永安侯台远眺，十常侍怕皇帝望见他们的房子而怪罪他们，就让人对皇帝说：“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汉灵帝自此就真的不敢再登高了。

（四）

十常侍不仅参与宫廷内的政争，图谋控制皇帝，掌握朝廷大权，而且还利用手中权力，贪污受贿，卖官鬻爵，任用亲信，对揭露他们劣迹的官员则无情打击，疯狂迫害。

据《后汉书》记载，十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不仅自己位高权重，势焰熏天，而且父兄子弟遍布地方，为官作宦，作威作福，鱼肉乡里，甚至连他们的家奴也借力沾光。张让有个家奴广泛结交，收受贿赂，“威形煊赫”。有个叫孟佗的人，“资产饶赡”，是个“土豪”，对这个家奴“倾竭馈问，无所遗爱”。家奴问孟佗“君何所欲”？称自己“力能办也”，孟佗说想拜见张让。但当时想拜见张让的人太多，这些人驾车前往张让的住处，“车恒数百千两”，孟佗后到，挤不到前面去，这个家奴乃率人出门迎接，大家以为孟佗与张让关系肯定密切，于是争相贿赂孟佗，孟佗拿出收受的一部分贿赂再贿赂张让，张让“大喜”，于是任命孟佗为凉州刺史。

对于异己分子，十常侍则是无情打击和打压。护军司马傅燮一直看不惯十常侍的作为，也向汉灵帝指出，“阉竖弄权，忠臣不进”是导致黄巾起义的重要原因，事为十常侍所知。傅燮受命率军镇压黄巾起义，立有大功，按规定应当论功行赏，但赵忠向灵帝进谗言诋毁傅燮，结果傅燮有功不赏，好在灵帝也没有加罪于他。左中郎将皇甫嵩为人正直，张让曾向他索贿，被他拒绝，张让记恨在心。皇甫嵩率军镇压黄巾起义，张让向灵帝报告说皇甫嵩“连战无功，所费者多”，将其罢职，收回他的将军印绶，把他贬为都乡侯，领地也削减了六千户，只剩二千户。为人正直的宦官吕强建议灵帝大赦党人，威胁到十常侍的利益，赵忠、夏恽等便诬陷吕强兄弟“贪秽”，让有关官员查问，吕强为免受辱，愤而自杀，赵忠、夏恽等又向灵帝进谗言，说吕强是畏罪自杀，唆使灵帝下令逮捕了吕强的亲属，并没收了其财产。

对于敢于揭露其罪行的官员，十常侍更是出以重手，置之死地而后快。黄巾起义爆发后，郎中张钧上书灵帝，指出张角之所以能兴兵作乱，且万人乐附，“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建议斩十常侍以谢百姓。汉灵帝很生气，说十常侍中总有好人吧，没理会张钧。张让则让人上书，诬陷张钧“学黄巾道”，是张角的追随者，将张钧逮捕，处死狱中。谏议大夫刘陶也上书说“天下大乱，皆由宦官”，十常侍则诬陷刘陶“与贼通情”，将其下狱，迫害致死。

十常侍现象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特殊产物。他们的阴谋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得逞，从客观上讲，是汉代的皇位继承制度和皇帝的颟顸昏聩给他们提供了条件，他们可借助皇帝来满足自己的无尽欲念；从主观上讲，是他们自己野心膨胀，贪欲无度，不知进退，以致身败名裂。

献给未来的精神食粮

□ 路文彬

法国作家雨果当年被流放根西岛期间，曾与一群下层贫民为邻。他非常关心住在附近的孩子，每周都要宴请他们，为他们举办聚会。一次，趁这些孩子们的家长都在场之际，他给他们做了一个演讲，在演讲中他这样说道：“孩子是我们必须要关心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你们知道他真实的名字吗？他的名字就叫‘未来’……无论我们为孩子做些什么，未来都将成百倍地回报给我们。这年轻的精灵，孩子，就是未来丰收的田野。他的生命里蕴含着社会的未来。让我们在这年轻精灵的身上播撒下正义的种子、快乐的种子吧。养育着这孩子，我们就是在养育着未来。”

因为心中有孩子，所以雨果的诸多作品即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也是献给未来最好的精神食粮。其实，雨果的演讲道出的也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基本标准，即当一位作家在为孩子进行创作的时候，他或她的心里首先要有一个名叫未来的孩子。

但是观察一下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可以发现，我们许多作家的心里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孩子。尽管他们的作品中到处都是孩子，但这些孩子只不过就是作家本人的影子，是他们滞留于过去的回忆。我们看不到作家对于儿童心理的特别关注。什么是可以给孩子看的，什么是不可以给孩子看的，作家们似乎并无明晰的认识界限。

孩子的成长尤其需要父母的关注，而父母的关注当然不能仅限于提供物质上的满足，他们还需要精神上的给予，这是对于父母提出的更高要求。他们必须设法动用智慧和时间通过与孩子之间的充分交流，给孩子如饥似渴的心灵以滋养。可是，在这些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笔下，父母往往是缺席的。我们压根看不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孩子只是一个个“疯丫头”“野小子”，他们同父母没有任何的交流，我们无法想象他们的精神世界会有怎样的家庭传承。父亲在外忙碌工作，母亲在家操持家务，此种家庭人际模式使得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伙伴永远没有父亲和母亲。相反，我在瑞典作家林格伦所塑造的一个名叫马迪根的疯丫头形象身上，却看到了其父母丰满的存在，看到了父母之于马迪根的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就是责任。

责任是爱，既然我们的作家不能自觉肩负起对于孩子的责任，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期待他们的作品成为孩子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呢？

虽然我们有些作家已经开始重视孩子的存在，但他们并不是从未来的开放视角去打量孩子的。他们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很精确地瞄准了孩子的心理，然而这种瞄准更多的却是迎合，只是一味想抓住孩子们的阅读兴趣。由于未来眼光的匮乏，这些问题几乎从不涉及孩子们的心灵和人格，作家显然是不知道该如何引导孩子的。对于一个孩子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品质，他如何才能担当起我们所希望的未来，我们的作家极少给予关心和思考。他们宣扬团结合作，结果忘却了自我独立；他们崇尚纪律，但又疏忽了自由；他们全力为孩子们构建一个纯粹、唯美、温暖的世界，可是一旦这些孩子遭遇那个污浊、丑陋、冷酷的世界又该怎么办呢？我们的作家所告诉孩子们的永远只是局限于眼前的半个世界，结果一旦另外半个世界出现，他们的故事就沦为了谎言。

未来向度的缺失致使我们的作家只能一再低估和压抑孩子的能力，对于他们必将面临的死亡、犯罪和邪恶等一系列问题都讳莫如深。正因受制于这没有未来深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我们的作家在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得到承认的同时，却对承认本身的权力毫无反思。比如，一个学习好又是班干部的学生被他们理所当然地看成品学兼优的学生，不过这种品学兼优却一定是用听话换来的：在家听父母的话，在校听老师的话。那么，这种听话就是一个孩子最重要的优秀品质吗？不可否认，这种品质可以最大限度保证一个孩子想在未来获得的生活，但它能保证一个社会所渴望的公平和正义吗？这种品质是讨人喜欢的，不过它真正鼓励的仅仅是一个孩子的占有欲望，而不是丰富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索和给予。

我们的作家只是凭着个人有限的人生经历在给孩子们写作，他们的思考有限，基于此，他们自然不会明白让孩子首先学会独立思考才是最重要的。就此而言，他们又怎么能担当起孩子未来领航者的角色？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必须拥有激发孩子思考的能力，通过和他们一起思考一起感受来奠定孩子追随真理的根基。我想起自己曾经翻译的奥地利儿童文学作家奥里夫的小说《鸟儿街上的岛屿》，其中作者时不时地会借助成人之间以及成人同孩子间的对话或争辩，来传达自己所坚持的价值观，启发孩子对此进行思考，哪怕他可能暂时还无法完全思考明白。

随想录

从《钦定宪法大纲》到《十九信条》

□ 金成波

维新派的努力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派惨淡经营了33年的洋务新政就此破产。《马关条约》的签订掀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同时，列强通过开设银行、在华设厂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满目苍夷的清王朝经济上亦成为列强的附庸，进而丧失了政治上的话语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这个时代最切实的写照。丧权辱国之痛、民族危机之严峻使整个社会开始觉醒，中国为何如此贫弱，如何才能救亡图存，这些问题为维新思想家们所广泛讨论。维新派的领军人物康有为强烈地批判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认为君权太尊，下情不能上达，君民不能合为一体，是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但是他并不主张废除君主制，他的“公羊三世说”认为中国正处于“据乱世”向“太平世”过渡的阶段，即“升平世”，这一阶段要让国家富强，就得改革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

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变法人士明确提出了君主立宪的诉求。不过，尽管维新派曾提出设议院、开国会、行君宪的要求，但是103天的变法转瞬崩溃于宫廷政变之中，短短百日的变法几乎也没有涉及维新思想中关于君主立宪制度方面的内容。维新派领导的戊戌变法在宫廷政变中烟消云散，但是立宪思想并没有就此灭亡，反而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清政府表现出的决心和成就

1905年前后，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这在中国的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人们普遍认为日本胜俄国，乃立宪政体胜专制政体之典范。这也成为清政府决定效仿西方、日本，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直接导火索。

1905年7月，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统治乏术的背景下，同时也迫于民间立宪舆论的压力，决定派亲贵大臣分赴海外各国考察宪政经验，为在我国实行立宪作思想上和实际上的准备。从各国宪政的考察比较中，五大臣对于日本主权在君的立宪政治最为认同并加以盛赞，认为只要把欧美议会民主的形式与日本王权在君的统治相结合，就能在不改变中国君主专制的前提下实行立宪，进而强调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三大好处——皇位永固、外患减轻、内乱可弥。慈禧太后被考察大臣所描述的“三大利”打动，为了防止革命危机和立宪派进一步渗透朝廷，为了维持政局，在1906年改政治考察馆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宣布预备立宪。但是，宣布预备立宪以后，清王朝一系列宪政措施都围绕着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展开，而对开国会行宪法尽量拖延。面对国内声势浩大的请愿活动和从速立宪的强烈呼声，出于维护政局稳定之需要，1907年8月，清政府又派大臣赴日英德三国考察。一年后，清政府颁发《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确定预备立宪期限为9年。同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颁布。

《钦定宪法大纲》大体上是仿行日本1889年由明治天皇颁布的《日本帝国宪法》而成，结构包括“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共23条。“君上大权”是正文，共14条，臣民权利义务只属于附则，共9条。在他们看来，各君主立宪之国，虽然国体不同、宪法互异，但宪法的精义不外乎是由“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为根本而衍生的各项臣民权利义务。虽然其结构简单、内容不完整，但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宪法性质的文件。

“预备”让民众丧失了耐心

《钦定宪法大纲》出台3个月，光绪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清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频临危亡的绝境，原本反对革命的立宪派是支持清朝立宪的，然而“皇族内阁”的出现，使他们的幻想落空，从而开始了新的转向，发起了数次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这迫使清廷在1910年让步，立宪期限由九年缩短为五年。但这一系列举措并没有遏制住革命党人推翻清朝的武装斗争进程，在清朝统治集团陷入空前孤立的同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后各省纷纷响应并宣布独立，革命的形势已经蔓延开来。迫于崩溃形势，清廷仅用3天时间就出台了以《政纲》为基础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但是，它的颁布，并未能挽救迅速覆亡的清朝，在统治者的观念中，当政者的权力分配是首要考虑的目标，认为通过调整权力分配就可以“以固邦本而维皇室”，但恰恰是这些自由和权利受到忽视的民众，奋起反抗为自身权利而斗争，最终形成了覆灭清王朝的根本力量。清王朝押在“预备立宪”上的这场政治赌博，随着清朝的覆亡而付诸东流。

随着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大厦最终的倾塌，“清末预备立宪是一个政治骗局”这样的说法一直为后来思想家的论著与教材所采纳，论据之一便是清末立宪采用的是“预备”的方式，在诏书中并没有规定立宪时间。这样的方式毫无疑问是无法实现的，只是统治集团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苟延残喘和逐渐消磨人民的革命意识而想出来的拖延之计。这一论点看似合理，清末预备立宪表面上是清末统治者根据局势分析，认识到体制缺陷而采取的一项自救措施。实则不然，清末立宪是清王朝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最后挣扎，是穷途末路之下的无奈抉择。这一点，从《钦定宪法大纲》与《十九信条》所规定内容便可看出。

《钦定宪法大纲》从制定程序上就可看出其不合理性，宪法本应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所制定，而这部文件是由被囚禁已久的傀儡皇帝“钦定”。从内容上看，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规定，较之日本更加漫无限制和充满弹性，而对于臣民权利的规定，范围非常狭窄，这一点从“君上大权”有足足23条、而“臣民权利”只有仅仅9条便可看出。再看《十九信条》，尽管较之《钦定宪法大纲》而言限缩了皇权，确定了关于皇帝、国会、责任内阁三者之间的相互制衡的虚君立宪制，但是对于臣民的自由平等权利却只字未提。

中华春秋

娄师德的肚量

□ 张晓政

唐朝宰相娄师德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成语“唾面自干”就出自于他。《新唐书·娄师德传》记载，娄师德的弟弟曾授任代州刺史，赴任前，娄师德问他：“如今我备位宰相，你又擢升州牧，荣宠过盛，别人难免嫉妒，你将何以自免?”他的弟弟回答：“自今以后就算有人把唾沫吐到我脸上，我也只是擦去而已，你不必为此忧虑。”娄师德却说：“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呀！别人把唾沫吐到你脸上，是因为有怒于你，你把它擦去了，便是忤逆他的意思，反而更令其愤怒。不如不去管它，让它自干，笑笑罢了。”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超乎寻常的忍让功夫，一些人对娄师德颇不以为然，甚至当面表示不满和蔑视，对此娄师德也都一笑了之，化为无形。

尽管有争议，但娄师德身上有两个特点还是得到了人们的承认。一个是他的能力才干。娄师德早年以进士授任江都县尉，扬州长史卢承业十分看重他，曾说：“娄师德乃台辅之才也，当以子孙相托，怎能以寻常下僚来相待呢!”娄师德果然也不负他所望，后来入为相、出为将，特别是统领西北边防数十年，业绩赫赫，被武则天赞赏为“文武材”。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肚量。娄师德与狄仁杰同朝为官，狄仁杰却颇看不起他，数次欲排斥他。这些都被武则天看在眼里。一次，武则天问狄仁杰：“你觉得娄师德如何?”狄仁杰回答：“领兵守城或许有些本领，但能否称得上贤能就不知了。”武则天又问：“他善知人吗?”狄仁杰回答：“我与他同僚，实在不知他还有知人之能。”武则天笑着说：“我重用你，便是娄师德举荐的，这就是知人啊!”说着命人取来十几篇奏章给狄仁杰看，竟都是娄师德为举荐狄仁杰而写的。狄仁杰看后着实惭愧，感慨道：“娄师德真乃有德之人，我受他包容却一直不知，我不如他啊!”

抛开对娄师德其他方面的评价不说，单从举荐狄仁杰这件事上，娄师德无疑表现出了令人敬佩的品行。首先，虽然都是同朝为官，但当狄仁杰数次排斥他的时候，他并未心生怨恨，表现出了极高的修养，正如孔子所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其次，尽管狄仁杰对他并不友好，但他知道狄仁杰是个人才，反而坚持不断地向武则天举荐，这又体现出了举贤不避仇的境界。最后，虽然狄仁杰因他而获重用，但他从未向狄仁杰透露过丝毫口风，他举荐狄仁杰，既不是为了播撒人情，也不是为了化解狄仁杰对他的排斥而进行的“利益交换”，这又展现出公心为上的品格。

令人欣慰的是，受到娄师德举荐的狄仁杰也是这样一位公心为上的政治家。作为武则天时期最重要的大臣之一，狄仁杰举荐选拔了许多官员，他所举荐的张柬之、姚崇等人，后来都成为一代名臣。

人物志